

日本论

戴季陶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切切实实地地下
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们的性格、
思想、风俗、国家和社会……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论

戴季陶 / 著

《日本论》一书初版于1939年，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参考著作。即使在其成书20多年后的今天，该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仍有一定的帮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论 / 戴季陶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6

ISBN 978-7-5463-5518-4

I. ①日… II. ①戴… III. ①民族性—研究—日本
IV. ①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0278号

日本论

著: 戴季陶

责任编辑: 于鑫 于伟群

封面设计: 茗尊设计

版式设计: 李媛

开本: 787 × 1092mm 1/32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683

发行部: 0431-86012675 0431-86012826(Fax)

网址: www.360hours.com

印刷: 长春良原印业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5518-4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683

出版前言



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1919年在上海主办《星期评论》。1920年夏一度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



REN BEN LUN

日本论

传部部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从事反共煽惑活动。1927年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孙中山去逝后，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他提出一套反动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革命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广泛传播，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夺权作舆论准备的。这些思想是我们要加以批判的。

戴季陶曾长期留学日本，后又多次跟随孙中山先生出访日本，对日本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

解。其《日本论》一书出版于1928年，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参考著作。即使在其成书70多年后的今天，该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仍有一定的帮助。这也是我们将该书重新出版的初衷。

当然，“戴季陶主义”中的思想在本书中也偶有流露，我们尽量将这些地方在书中标注出来，请读者在阅读时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对书中的某些内容加了注语，以“注释”栏目标出，并适当加以配图，以使读者了解内容全貌。

胡汉民序

一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



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它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

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伦理，好像英国的 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

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



山鹿素行



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

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略见原书中篇第一节）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

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



板垣退助



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是戴季陶主义的主要观点）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煞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

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



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二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

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殁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



西乡隆盛铜像

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的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的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韦尔斯说，欧洲人不知中国，其



伊藤博文



黑格尔



吉田松荫

重要意义就在此点。我们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页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觉得他无甚心得，并不深刻真挚，也是此理。到得本国人说本国的民族，这些条件工具是比之外国容易完备了，然而却有第二种的障碍，这种障碍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碍，姑且撇开，而自身的因缘成为心理的拘囚偏执，就会弄到如黑智儿（即黑格尔）那样一个大哲学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认做神的表现。世界的选民，其实如季陶先生此书所引吉田松荫《坐狱日录》一段话，也和黑智儿的出发点相同，不过一个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个穿了近代哲学的衣而已。《大学》说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而莫知其苗之硕。”